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
晋
南
北
朝

巴蜀书社

译注 于 白

审阅 周勋初

梁书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梁书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侯跃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梁书选译

于白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25千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80523-637-2/Z·79

定 价：140.00元（第三批35种）

于白

周勛初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自西晋“永嘉之乱”至隋文帝平陈（公元304—589年）的近三百年间，我国出现了长期混战的割据局面，各种力量组合分化、起伏消长，情况十分复杂。《梁书》记载的是起自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迄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共五十六年间的梁朝史事。

《梁书》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合为五十六卷，唐姚思廉修撰。姚思廉又撰有《陈书》三十六卷。《梁书》和《陈书》的编著，是从思廉的父亲姚察开始的。姚察（533—606）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据《陈书·姚察传》，姚察自幼勤奋好学，广蓄图书典籍，学识渊博。他精研《汉书》，在出使北周时曾解答学者的质疑，甚为

问难者叹服，被誉为史学长才。姚察在陈时，历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是与徐陵、江总齐名的文士。陈亡入隋，他又受到隋文帝的赏识，历任太子内舍人、秘书丞。隋文帝对朝臣说：“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陈书·姚察传》）。梁史的修撰始于陈代，姚察以史职参与其事，至陈亡还没有完成，但积累了国史旧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姚察奉诏撰梁、陈二史。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终年七十四岁。姚察临终前，嘱托儿子思廉续成其志。

姚思廉（557—637）字简之，《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思廉历仕陈、隋、唐三朝，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侑（即隋恭帝）侍读；唐初，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迁散骑常侍，被列为十八学士之一。思廉在父亲去世后，就开始补续二史。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修撰隋以前各朝史事，诏姚思廉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书》和《陈书》。魏征为监修。思廉从贞观二年实际上已开始正式编撰二史了，到贞观九年（637）书成，历时共九年，当时思廉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两年后，思廉病逝，终年八十。如果从开皇九年姚察奉诏撰梁、陈二史来推算，则《梁书》、《陈

书》的完成经历了四十八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凝聚了两代人的心血。梁、陈二史的成书情形，与司马迁继司马谈完成《史记》、班固继班彪完成《汉书》的情况相似。

梁朝是南朝时期学术文化最繁荣的一个朝代，有撰史学士及著士等史职，同时还临时征调其他官员参与修撰国史的工作。梁武帝时，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等曾相承撰录《梁书》一百卷，侯景之乱后，这部史籍被梁元帝萧绎运往江陵，在北周攻陷江陵时，被付之一炬。陈时，又重新开始了梁史的编纂工作，据《隋书·经籍志》载，计有许亨《梁史》五十三卷、刘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最《梁后略》十卷、萧韶《太清纪》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等，在姚思廉修《梁书》时都还存在。除这些书外，当时还有不少起居注和杂史等材料。上述诸书现在都已散佚，因此《梁书》就成了现存较为原始的文献了。它保存了梁代有关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民族、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是研究梁朝和南北朝历史的一部必读书。

《梁书》的作者具有较高的史识，比如他为范缜立了专传。齐梁时代，统治阶层僻处江左，苟且

偷安，不思恢复失地，却竭力信崇佛教，一味沉溺于佛法，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豪华宏大的佛寺，结果上行下效，耗资巨万，百姓深受其害。梁武帝萧衍就曾以帝王之身，四次舍身同泰寺，随后即用重金赎回。就在这佛教炽盛的时代，范缜却倡言富贵贫贱的偶然和因果报应的无稽，并著《神灭论》，驳难佛教神学以及其他鬼神信仰。姚思廉以客观的笔法记叙了范缜一生的行迹，详细记载了范缜面对齐竟陵王萧子良“集僧难之不能屈”和梁武帝召集王公朝贵及僧正六十余人反驳《神灭论》，范缜仍不为所屈的事迹，表彰了范缜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并且收录了《神灭论》全文，使这篇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得以保存。又如在《贺琛传》中，详细记载了贺琛有关时务的长篇奏疏和梁武帝无理的训斥之词。南朝时士族阶层可以享受免除税役的特权，而负担却全部落在非士族的庶民肩上，士族贵人唯以侈靡为务。贺琛的奏疏，反映了士族的贪婪腐朽和人民生活的贫困，并揭示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梁武帝宽容放纵士族贵族和政刑谬乱。奏疏共述四事，陈寅恪先生认为，它们表明梁朝的统治阶级已经走上了败亡之路，无可挽回。梁武帝个人的生活虽然可以说是节俭的，但是整个上层社会都为奢靡之风所笼罩，个人的问题与全部社会无

关（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贺琛传》详载贺琛的奏疏，也可见出修史者的见识。侯景之乱是南朝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标志着梁朝的覆亡在即，而且标志着士族统治的结束。姚思廉用很长的篇幅作《侯景传》，详细记述了侯景之乱的全过程，展示了侯景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侯景围困建康时，梁朝的文武官员或逃或降，赶来救援的人名为勤王，实际上多是观望而已，但面对强敌，“吴人莫不怨愤，于是各立城栅拒守”，这也表明了《梁书》作者的撰史态度。还有《梁书》专设《诸夷传》，记录了二十六个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物产以及与梁朝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今天研究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珍贵材料。

六朝的文风，以骈四俪六为上，即使是叙事之文，也多以四字为句，芜冗繁琐。这种风气一直绵延到唐初，在这种流风的影响下，各家史籍的行文也都受到影响。而姚察、姚思廉父子却以司马迁、班固为榜样，崇尚散文，在撰史过程中以单行散文为主，对六朝的文体文风进行变革。历来论文家以为古文的复兴和重振滥觞于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其实身在陈末至唐初的姚氏父子已经开其先河了。所以清人赵翼说：“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

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廿二史劄记·古文自姚察始》）

《梁书》文笔简练，行文流畅。比如《武帝本纪》叙述萧衍兴兵灭齐，既将当时纷繁复杂的局势记述得清楚明了，又表现出萧衍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宏大的气魄，简然有法。《陈庆之传》则用简洁生动的文笔刻画了陈庆之其人其事，再现了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昌义之传》叙述钟离之战，《康绚传》叙述淮堰之作，都笔力遒劲，曲折明畅，读来酣畅淋漓。

《梁书》除了有上述特点外，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最明显的缺点是多隐讳之笔，姚察、姚思廉父子撰《梁史》，大多依据国史旧闻，并沿袭其“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的笔法，虚词溢美，文过饰非。高祖之弟临川王萧宏于天监四年（505）率大军北伐，所辖部队精锐强大，被魏人称为一百多年来未曾见过的强兵，但萧宏庸碌无能，领兵无方，听说魏军援兵赶到，先自胆怯，不但不敢迎战，反而下令“人马有前行者死”，随后更弃军而逃，导致丧师失地。高祖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倒加官晋爵，因为他只知搜刮财货，并无政治野心，所以萧衍不疑忌他，反而以亲族关系百般优待。此事《南史·临川王宏传》载之甚详，《梁书·临川王宏

传》则仅云“会征役久，有诏班师”。这样的例子在《梁书》中不一而足。

《梁书》记叙较详，但过多地载录了许多无用的诏策表疏和私家诗赋文章，失之冗芜，殊为不当。《梁书》还有许多自相矛盾前后牴牾之处，如《侯景传》既称“张彪起义”，又称“彪寇钱塘”；《何敬容传》称“敬容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而《江革传》则云“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梁书》记年月也有错误。这些问题在阅读《梁书》时应当注意。

《南史》为唐李延寿所撰，记述了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一百七十年的史事，它大体是删补移易宋、齐、梁、陈四书而成。其中对梁代史事增补较多，保存了许多今已亡佚的笔记、杂录等资料，并纠正了《梁书》的一些谬误，所以在阅读《梁书》时可资参照。《梁书》无志。唐于志宁、李淳风等为梁、陈、隋、齐、周五代史撰成十志，历叙各朝典章制度，称《五代史志》，后来各史单行，十志遂并入《隋书》。所以研读《梁书》时应当参阅《隋书》的十志。

《梁书》的通行版本，有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重刊明汲古阁本和百衲本影印南宋蜀大字本，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为目前最便于读者阅读的本子。

《梁书》共五十六卷，人物众多，由于篇幅限制，本书仅选译了十四篇。本书选文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注译了关系到梁朝兴衰的一些人物，他们贯穿了梁朝的始终。另也选译了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梁朝是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人才辈出，本应多选，但这套丛书中《南史选译》的选文侧重于此，为避重复，所以昭明太子、沈约、刘勰等传没有再选录。注释以职官、地名和不易译出的典章制度为主，相同条目一般不重复出注，今译采用直译。

由于注译者水平有限，选文及注译欠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及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注译工作完成后，承蒙郁贤浩教授审阅一过，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特致谢忱。

注译者

1992 4. 于南京